

## 評高明士，《中國教育制度史論》

臺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1999。369頁。

劉祥光\*

本書作者高明士教授長久以來對於中國教育史的關心是有目共睹的，研究中國教育史的人想必都會感謝高教授多年來在這領域的努力。這本《中國教育制度史論》是新作之一，顧名思義，談的是制度方面的問題。作者在書中有五章專論這方面的問題。

作者在本書揭櫫的最重要一個論點是，「一部中國教育史，可說是由『學』到『廟學』的發展過程」（頁46），中國傳統學校可說是以「廟學制」為中心。因此書中對「廟學制」的特色與重要性多所闡述，可謂發前人所未發者。其中作者以書院的「廟學化」說明書院受官學的影響，使我們對不少學者所主張的「書院官學化」更為具體地又多一層理解。這是本書的一個重要貢獻。而佔本書篇幅一半以上的附錄，是作者仔細由地方志中輯出有關傳統官學與書院的資料加以整理而成，更見作者對中國教育史的用心。

然而，在「廟學」這一大概念下，作者也留下了若干空間讓對這領域有興趣的人能繼續努力，以下是筆者的一些看法。

在導論部分的「教育理想的具象化」小節中作者說：「學校教育透過『廟學』形制的規範，使為師者身兼經師與人師，可視為聖賢的化身，學生學習的榜樣；而學子平時與廟中聖賢為鄰，又瞻仰為師之

---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

人格、學問，乃體會步登聖賢堂奧之境是有可能的。」（頁 30）這段話確有其道理，因為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的理想。不過，論制度似須略談其實際運作狀況。假如我們理解傳統學校的功能有極大的部分是「為國儲（選）才」，也就是說，許多進入學校的士人最終目的是取得功名。那麼從這個角度而言，學校（甚至包括後來的書院）可能是（在某個角度而言）充滿功利動機的地方。士子到地方學校的一個重要——可能是最重要的——目的就是為了能考中進士；就此而言，學校裡所教的，有相當的比例就是教人如何中舉的技巧。所以士子在學所讀的內容，有相當的比例是「時文」——即宋代通過經義及策論考試的文章，到了明清就是八股文。而如進一步把明清時代學校的月書、季考、歲考，乃至科考等考試一併考慮，則以考試為重的教學就很明顯了。就這點而言，傳統地方學校的理想性，由於在科學的籠罩下，有其相當的侷限。

作者也注意到了學校內部的建築。有棟建築作者在附錄中列舉，但在正文中未著墨的，就是魁星閣（有時別寫成「奎」星樓）。「奎星」是中國古代神話中主文運及文章的星宿。後改「奎星」為「魁星」。而「魁星」是北斗七星中的第一顆星，在過去被引喻為考科舉拔得頭籌，因此許多地方學校立有魁星閣，其意不言可喻。這個建制從什麼時候開始，有待詳考。然而從其名稱可知立此閣之目的在於祝福士子考得進士。由此可見得學校教育的重心有相當的部分是擺在科舉上。如果我們再注意到至少從宋代開始，地方官員與地方人士很留心學校的風水問題，會為了科舉問題而遷移某個門或某棟建築的位置，甚或另擇他址，則更可理解傳統學校教育中所隱含的功利心態。

再就教官一職而論，宋以後，教官之職事實上是「冷官」或「冷職」。許多人任教職，是出於無奈，只把這個職位當成是人生的一個過渡階段。有些人考中進士後，其長輩甚至勸他不要出任教職，可見

教職在士大夫心目中的份量。那麼不得已出任該職者會認真其事嗎？這方面有許多史料可佐証。到了明代中葉以後，出任教官一職之人，許多是有一定年紀的貢生。這些人之所以會成爲貢生，一方面當然是因爲是科舉制度下的「遺才」；另一方面，從功利的角度而言，他們是「失敗者」。如果多數士子以中進士爲最高目標，他們看到學校中以貢生出身的教官，多數人心裡會怎麼想？

至於學校生活更是探討這一制度不能忽略之處。有一點值得注意的是，以我們現在的立場來說，學校生活是我們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在我們的回憶中，無論是學校帶給我們的滋味是甜酸苦辣，總是佔相當的篇幅。反觀過去的文人，他們很少回憶起他們在學校的那段日子。爲什麼？如果地方學校是塑造士子道德理想的重要場所，爲什麼我們看不到這樣的資料？這可能和他們在學校裡的經驗有很大的關係。

不過誠如作者所說，學校關乎道德風化甚鉅。學校中除了孔廟外，還有其他的建築也帶有很高的道德理想性，就以作者曾注意到卻著墨無多的「鄉賢祠」與「名宦祠」爲例。這兩個祠在明代開始出現，是從宋代州學裡的「先賢祠」或「〔幾〕先生祠」逐漸轉變而來。鄉賢祠中所奉祀者是本地已故的耆老，他們的道德文章死後被當地人士公推足爲本地楷模；而名宦祠中祭祀的是曾任職本地的官員而死後爲當地人士公推對本地有貢獻者。這兩個祠立在學校裡，目的是爲了讓士子能以這兩種人爲榜樣——如果士子考上進士，他們出外任官，能以這些人爲楷模，對當地有異常的貢獻，離職後被人懷念；而如果士子無法在科舉上有所成就，則希望他們的道德文章能像過去的鄉賢一樣，被本地人所景仰。這樣的建制其理想性的確不能說不高。

但是這樣的理想在明代後葉卻開始變質。至少在鄉賢祠方面，由於地方上一些士大夫家族介入鄉賢的選舉，使得入祀者多爲地方大族

之祖先。這些入祀者道德文章未必特著，卻只因是大族之故就入選，自然不符原先規定，其結果就是入祀者浮濫。雖然明代中央政府曾就此問題三令五申嚴其選，但浮濫的情形到清中葉都還可發現。就這點而言，其道德教化的理想性也就因地方政治之故而被扭曲了。從這個建制可看出傳統中國教育制度的確有其理想所在，但實際情況不能光看字面上的制度描寫，還須觀察其運作。

作者在書中也流露出對傳統教育之珍視，也對其消逝表示惋惜。晚清以降，西風東漸，傳統教育受到衝擊。就學制而言，傳統的「廟學制」崩潰，民國以後，學制完全西化。作者的看法是清末太平天國的反孔，民國成立之後學校不祀孔，「五四」時代的反孔風潮，以及國民政府將孔廟歸內政部管轄等因素終使廟學制崩解。作者在其中尤致力於制度上的闡述。由制度結構上來解釋，固然可求得部分原因，但要得到較全面的瞭解，可能須從教育內容著手。換言之，課程內容或許是重要因素。說得更明確些，是近代知識份子〔及官員〕對於知識的認知的改變影響了學制。比較一下傳統教育的內容和受西力衝擊而改制的教育內容，可以發現差異相當大。也就是說，新學制下學生所要學習的內容許多是傳統教育未包括進去的。這表示，無論是清末或是民國的政府及知識份子，顯然都認識到傳統教育內容不足應付當時中國所面對的問題。不僅如此，他們也承認傳統學制也不足應付新的情況，因此到了民國時代，教育的內容與制度可說全面翻新。

新的學制代表的不僅是知識廣度的增加，更是清楚標明知識的進階性。清季開始的新學制乃至於民國十一年開始的「六三三」制，背後的假設是知識的學習有其進階性，由一個階段到另一個階段。其假設是：一個完整的小學教育是六年，完整的初級中學教育是三年，完整的高級中學教育是三年，其間無法躐等。但這並不是說傳統教育沒有進階性，只不過指出傳統的教育並未將進階性予以明確而全面地制

度化。再加上傳統教育的內容在西力籠罩下顯得廣度不足，以儒學經典為中心的教育自然受到摧枯拉朽般地衝擊。在這種情況下，「廟學制」還能屹立不搖就很難了。這也就是說，一旦政府中的決策之士以及有發言權的知識份子都認為傳統教育不足以建設一個現代國家，並明確地引入西方學制納進國家教育體制，「廟學制」的地位便一去不復返了。

整體而言，這是一本有啟發性的書，作者在書中提出了不少富有啟發性的論點，開拓出許多空間讓將來對於中國教育史有興趣的學者繼續研究。